

跨学科视域中的中国莎士比亚政治批评研究

Chinese Shakespearean Political Criticism in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李伟昉 (Li Weifang) 杨康恩 (Yang Kangen)

内容摘要: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是文学研究中无法绕开的核心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莎士比亚政治批评历经三个阶段的演进，呈现出由“文本的政治—作者的政治—批评的政治”所构成的三重阐释结构。这一结构从初期的互动一致逐渐走向后期的微妙嬗变，形成了一条清晰的演进轨迹，为深入开掘莎剧丰富的政治意涵提供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阐释空间。对上述三重阐释结构的梳理与分析表明，中国的莎士比亚政治批评本质上是以文学审美为根基的跨政治研究，其根本旨归并非将文学跨学科研究简化为政治阐释，而是在保持文学主体性的前提下，自觉强化中国学术的主体意识，积极构建彰显中国特色、立足中国语境的自主知识话语体系。

关键词: 莎士比亚；政治批评；鲜明特征；文学跨学科研究；主体意识

作者简介: 李伟昉，河南大学莎士比亚与跨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英美文学研究；杨康恩，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莎士比亚研究。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莎士比亚戏剧本源系统整理与传承比较研究”【项目批号：19ZDA294】阶段性成果。

Title: Chinese Shakespearean Political Criticism in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has always been an inescapable core issue in literary studi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olitical criticism of Shakespeare in China has undergone three major stages of development, giving rise to a tripartite interpretive structure composed of the “politics of the text,” the “politics of the author,” and the “politics of criticism.” This structure has gradually evolved from an initial state of mutual alignment to more subtle transformations in later stages, forming a clear trajectory of development. Such an evolution has opened up a multilayered and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ive space for probing the rich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Shakespeare's drama. An examination of this tripartite interpretive structure reveals that Chinese political criticism of Shakespeare is essentially a form of cross-political inquiry grounded in literary aesthetics. Its fundamental aim is not to

reduce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research to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but rather, while preserving the autonomy of literature, to consciously strengthen China's scholarly subjectivity and to actively construct an independent discourse system of knowledge that reflect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s rooted in the Chinese context.

Keywords: Shakespeare; political criticism; distinct feature;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research; subject consciousness

Authors: **Li Weifang** is Professor at the Center for Shakespeare and Cross-cultural Studie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His major fields of inquiry includ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liweifanghd@126.com). **Yang Kangen** is a Ph. D. student at the Faculty of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His major fields of inquiry includ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Shakespearean studies (Email: yke@henu.edu.cn).

美国比较文学学者亨利·雷马克(Henry Remak)1961年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一文中提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1)。由此,继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之后,平行研究和文学跨学科研究被纳入比较文学范畴,其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尤其是文学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种民主且有活力的合作模式,以取代老套、排外且带有派系属性的学科”(乔·莫兰5)。本文主要以莎士比亚政治批评为中心,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莎士比亚戏剧的政治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脉络,探讨其中的共性问题,以期更加深入地揭示莎士比亚作为经典的存在方式及其丰富的社会政治文化内涵。

一、中国莎士比亚政治批评发展三阶段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自古至今在中西文化传统中都是一个经典议题。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主体论等理论主张的提出,反映了政治对文学的深刻影响以及文学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努力。这在中国莎士比亚政治批评领域表现尤为明显。

(一) 阶级性与人民性:十七年时期的莎士比亚政治批评

苏联莎评从1930年代前后开始陆续介绍到中国,对国内学界将莎士比亚从“非现实主义作家”修正为“杰出现实主义作家”的认知转向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以阿尼克斯特(Alexander Anikst)等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成果,更是对中国莎评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例如,阿尼克斯特坚持反映论观点,认为莎剧充分反映了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历史

剧“都充满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必然战胜封建割据”(《莎士比亚的戏剧》30)的思想。在戏剧冲突与人物形象方面,他试图以阶级视角寻找冲突的根源;在阶级批判方面,他认为莎剧是“天才的艺术家直接对整个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封愤怒的起诉书”(《莎士比亚的戏剧》78)。在“人民性”上,他将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都看作是“在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与人民戏剧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英国文学史纲》90-91)。十七年时期,中国莎士比亚研究吸取苏联莎评范式,以反映论为基础,以阶级分析作为批评的切入点成为当时莎士比亚研究的鲜明特征,代表人物是卞之琳、陈嘉、吴兴华、赵澧等。当然,他们与阿尼克斯特及其相互之间的观点也不尽相同,这在“反映论”与“人民性”两个问题上表现得较为突出。

首先,他们都视莎剧为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在“如何反映”这一问题上的理解并不相同。卞之琳在“《哈姆雷特》译本序”中认为,英国资产阶级在获得统治权后暴露出贪婪本性,从反封建进步阶级转变为严酷剥削人民的统治阶级,并在1600年左右造成频繁的严重社会动荡事件,因此《哈姆雷特》中反映的丑恶社会现象,正是当时英国社会的“影射”与“概括”(125)。吴兴华在“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中同样坚持反映论,认为莎剧是以史实“说明现在,照亮未来”,用现在解释并重新认识历史。但他认为把戏剧的情节和人物与英国当时的社会直接关联的做法是“徒劳无功的”(109)。尽管如此,吴兴华仍然把亨利王子的“荒唐行为”视为历史上亨利王子“和罗拉派接近的一种曲折的反映”(115)。如此一来,他既排斥文学与作家时代背景的粗放式对应,试图跳出这种研究范式的束缚,又不得不从作品中寻找与历史事件相关联的蛛丝马迹。由此窥见该时期批评者的状态与批评范式的单一。

其次,关于莎士比亚“人民性”的评价问题。卞之琳、陈嘉、吴兴华、赵澧等学者都认可莎士比亚反封建割据、维护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立场,但对其“人民性”的评价存有分歧。卞之琳认为英国资产阶级掌权前后对待人民态度的变化,造成人文主义者的分化:要么“与倒行逆施的统治阶级同流合污”,要么“站到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民大众方面”(“《哈姆雷特》译本序”128),而莎士比亚就选择了后者。陈嘉认为莎士比亚虽然肯定人民大众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却较少呈现贵族和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其进步意义主要在于揭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英国社会中日益增强的唯利是图思想意识”,推崇“爱国主义思想”(“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中所流露的政治见解”151)。赵澧则认为莎士比亚虽然看到人民群众的社会力量,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力量在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而是以“彻头彻尾资产阶级”观点,把人民群众刻画为散漫、愚昧和盲从的“群氓”(赵澧26)。

总体而言,从1949年到1966年,中国莎士比亚政治批评虽然具有模式化的特点,但对莎士比亚在反封建、爱国思想以及揭露资产阶级的贪婪本性等方面的评价是积极的,对其刻画人民群众负面形象的做法归结为时代局限

性。然而，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莎士比亚的政治批评逐渐演化为“批评的政治”问题。前一时期被认为具有“丰富性”内容的莎士比亚代之以中心主题的标准简化，同时强调和放大莎士比亚的“模糊矛盾的阶级调和论”“悲观主义的宿命论”“爱情至上”等方面的局限性。¹ 莎士比亚研究随后陷入沉寂。

（二）沿袭与调整：1978-2000 中国莎士比亚政治批评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莎士比亚研究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首先解禁。不过，长期形成的思维批评范式一时难以改变，密切联系莎士比亚时代的政治背景，仍然是莎士比亚政治批评的主要思路。例如，王忠祥虽然反对《麦克白》是迎合詹姆斯一世政治需要的观点，但仍然指出它有“政治影射意义”（王忠祥 8），回应了当时社会普遍关注的内战与王位继承问题。肖锦龙提出，莎士比亚是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代表的观点是错误的，其政治思想是维护封建王权、等级秩序等“封建传统观念的承袭和延续”，是“落后的而不是进步”（肖锦龙 27）。

杨周翰编选的《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为我国莎氏研究提供了在苏联莎评模式之外的批评理论和方法参照，使我国学者在进一步了解西方莎评史尤其是 20 世纪丰富多彩的莎评基础上，开始对以阶级分析为主导的批评范式进行有意识的调整。例如，孙家琇反对简单抽象地理解哈姆雷特，力求从他所面临的时代大环境和宫廷小环境，以及人物关系的变化等角度，全面深入剖析“哈姆雷特的世界”（孙家琇 63），认为王室罪恶、社会黑暗、道德败坏、人际关系的极端悖谬，是理解哈姆雷特精神危机的关键。孙家琇是在情节与人物等分析基础上阐释《哈姆雷特》的政治内涵，而非简单地以阶级划分为标准的价值评判。从中可以看出，该时期批评者试图摆脱苏联莎评范式的努力，研究重点也从政治立场、政治观念转向戏剧结构、人物形象等审美层面。正如方平所言：“谈莎剧必须从莎剧本身出发，再没有其他更可靠的出发了”

（方平 356）。虽然方平的文章仍有反映论与阶级斗争的色彩，但已在竭力把文本的政治内涵与时代背景小心加以分离。批评范式的重要转变大致出现在 1990 年代中期。例如，孟宪强认为《裘力斯·凯撒》的政治主题可以从作者对凯撒形象的塑造中来理解，反对以阿尼克斯特为代表的凯撒属于专制暴君的观点。他通过细致分析凯撒拒绝接受王冠、受民拥戴、理事先公后私、部下与政敌的评价、去世后的异象以及凯撒鬼魂出场等情节，认为凯撒属于开明君王的典型形象，体现了作者主张开明君主治国、反对“非法篡夺合法权力以避免国家的动荡与内战”（孟宪强 90）的政治观念。该文以文本细读法观照人物形象，阐释其蕴含的政治观念，摒弃了阶级先行、与社会生活机械联系的做法，显示出对苏联莎评范式的调整基本完成。

总之，十七年时期，学界对反映论的理解突出文学的认识功能，强调文

1 参见 洪子诚：“1964：‘我们知道的比莎士比亚少？’——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文艺研究》11（2021）：72。

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突出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使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属工具。至 1980 年代，以童庆炳、钱钟文为代表的学者，将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方式理解为一种审美反映，提出“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对反映论的新解凸显了文学反映论的审美功能。在 1990 年代，王元骧又试图突破反映论的认识性，以彰显其实践性偏向。¹可以说，以孙家琏、孟宪强为代表的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对苏联莎评范式的调整，是该时期学界对认识论的理解不断拓展和深化的体现。

（三）异彩纷呈：新世纪中国莎士比亚政治批评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诸如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解构主义等众多的文学批评理论纷纷被引至我国，但被广泛应用到莎士比亚政治批评实践中，则主要是在新世纪之后。与此同时，在 21 世纪初被甘阳、刘小枫介绍到中国的施特劳斯学派，也对该领域产生了日益深刻的影响。受上述理论及其批评范式的影响，新世纪以来的莎士比亚政治批评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征。

冯伟的“《李尔王》与早期现代英国的王权思想”探讨了《李尔王》中的政治思想与早期现代英国的王权思想的互动关系以及权力机制的运行过程，认为作者通过李尔形象的转变，旨在强调君王的神性“只是一种后天建构”，君王之躯“与其臣民实则并无二致”（36）。这与詹姆斯一世所主张的君权神授理论相悖，也是作者对王权与国家主权合法性的隐微质疑。胡鹏考察了《麦克白》第四幕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御触治疗”的情节与英国政治的微妙关系，认为作者通过“御触治疗”仪式，或被认为是恭维国王，或被认为是国王进行劝诫与警醒，“体现出对君王神圣性的塑造和解构”（“仪式、巫术与政治” 84）。上述两文把莎剧情节与莎士比亚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以探究戏剧与国家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具有明显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特征。这种文本内外联动式的解读，总体上属于历史主义的批评范式。

施特劳斯学派倡导的政治哲学则拒斥这种历史主义，试图剥离莎剧中的时代因素，以探寻莎士比亚的永恒政治智慧。冯伟的“罗马的民主：《裘力斯·凯撒》中的罗马政治”认为，该剧的真正主角是拥有强大建设或破坏性力量的罗马平民整体，“既打破了凯撒不朽的个人神话，也粉碎了布鲁图斯对于自由和民主的政治理想”（5），表达了对民主政制完美无缺的质疑，触及民主与暴政、正义、法治的关系等政治哲学命题。陈会亮也通过探讨《裘力斯·凯撒》中的政治智慧，认为凯撒与勃鲁托斯反叛集团的矛盾冲突，涉及罗马君主政体与共和政体之争，而凯撒象征着“对君主政制的肯定”（“论《裘力斯·凯撒》中的矛盾冲突与‘凯撒精神’” 137），直指“理想的君王形象应该是怎样的”（“《裘力斯·凯撒》中‘政制对决’问题及其意义” 77）等核心问题。陈雷则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血气”概念以

1 参见 张永清：“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拓展与突破”，《学术月刊》3（2022）：172-182。

及古希腊传统的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出发，来阐释《科利奥兰纳斯》的政治智慧，认为科利奥兰纳斯与共和初期的古罗马均由“血气”主导，象征“罗马政治体内部疾病”（陈雷 13），即欲望在理性缺失下没有节制，共和政体滑向寡头政制。

从政治符号学角度解读莎剧中的政治思想，也是该领域较为前沿的批评范式。胡鹏的“香气的隐喻：《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身体政治”通过对克莉奥佩特拉的香气所隐喻的身体政治及其运作过程的分析，认为香气既构建了女王“淫妇”的独特身份，又与异域风情密切相连，“通过赋予香气权力，她的影响力从自身、宫廷延伸到了其统治帝国之外并以微妙的方式运作者”（78）。围绕莎剧中的身体政治，也持续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例如彭磊认为，《科利奥兰纳斯》中“古典作家的身体各器官反叛肚子的寓言”和“中世纪的以头作为身体之王的寓言”，预示着“罗马政治的缺陷”，不仅“罗马呈现为一个分裂的、病态的政治身体”，而且科利奥兰纳斯也是“危害罗马共和的一个生病的肢体”（“《科利奥兰纳斯》中的政治身体寓言” 67）。莎士比亚在与古典、与同时代政治思想传统的互动中彰显其独特的政治思考。于艳平等学者也以《科利奥兰纳斯》中伏伦妮娅的视角为中心，认为作者“围绕女性一身体一政治这一脉络，通过对伏伦妮娅的隐性政治参与与其家庭教育方式之间关系的想象与构建，将家庭伦理与国家政治有机联系在一起，以彰显其家国同构的思想”（于艳平 李伟昉 13）。

二、中国莎士比亚政治批评的鲜明特征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莎士比亚政治批评实践，不难发现“政治”一词的概念内涵与外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指涉。例如在十七年时期，以阶级分析为主的批评彰显了“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列宁 308）成为这一政治观的概括。这种阶级分析既包括文本内虚构故事的阶级分析，也包括文本外莎士比亚及其时代的阶级分析，二者以“反映论”相连接。这种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论式的批评，明显受学者所处政治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莎士比亚研究领域，而且存在于整个外国文学研究乃至整个文学研究领域。因此，中国莎士比亚政治批评经历的三个不同阶段，呈现出一个鲜明特征，即文本的政治—作者的政治—批评的政治所形成的文学与政治的三重结构，从互动一致到微妙嬗变的渐进历程，为我们深入探寻莎剧的丰富政治意涵提供了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空间。

在十七年时期，文本的政治—作者的政治—批评的政治三者总体保持互动一致。例如，卞之琳以反映论为基础将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所面临的社会处境进行相互参照，认为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都能认识到人文主义的力量却找不到根除社会罪恶的斗争方式，都能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却不信任人民大

众的集体斗争行动”（131）。这种把莎士比亚与哈姆雷特等同的分析，显示了“文本的政治”与“作者的政治”的一致性。同时，他认为这种矛盾源于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思想家的阶级局限性，看不到先进思想与广大民众相结合产生的改天换地的力量，“正是代表人民的先进思想和脱离人民的斗争行动产生了哈姆雷特的悲剧——时代的悲剧”（132）。显然，这种结论带有明显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取得革命胜利的经验总结的色彩，使“作者的政治”与“批评的政治”保持一致。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经验总结实乃历史的必然。

新时期以后，批评者的政治环境的改善带来批评范式的相应调整，批评者不再把文本的政治问题与作者的政治观念及其时代的政治问题机械地直接关联，三者的一致性出现些微变化。批评范式的调整自然会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体现在莎士比亚批评领域，就是对前一时期阶级性批评结论的商榷，例如对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典型形象所进行的反思。陈嘉一改自己十余年前的看法，试图对哈姆雷特是人文主义典型形象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其“未免过火了，带有片面性”（“《哈姆莱特》剧中两个问题的商榷”4）。叶舒宪也认为哈姆雷特的行动中充满封建思想与宗教神学思想，将其视作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代表的观点，“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59）。高万隆从封建意识、人生观、爱情观、性格特征等方面否认哈姆雷特是“人文主义思想家”（92）。从丛认为从王子在威登堡大学求学来认定其人文主义思想的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人的思想与其所处环境的主流思想并不完全相符。她同时指出，否认哈姆雷特人文主义者典型形象并不等同于否认他身上存在的“人文主义思想萌芽”（44），也不意味着否定关于莎士比亚是人文主义者的界定，主张把作家和人物的思想区分开来发表评论。这说明“批评的政治”影响相对弱化之后，批评者开始把“文本的政治”与“作者的政治”更加小心地予以区分，以突显文本所蕴含的政治倾向。

与此相比，文化唯物主义把政治的概念拓展至文化领域，把“文本的政治”问题看作话语权力的运作，试图透过文本政治问题突显作者的政治观念与权力掌控下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商榷过程。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政治概念是宏观的权力政治，那么文化唯物主义者所言的政治就是微观的文化政治，对莎剧的政治分析细分到“身体政治”“性别政治”等方面。与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在“作者的政治”层面突显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主张不同，政治哲学式莎评极力寻找文本的政治哲学内涵，并往往视之为莎士比亚的“隐微教诲”。“隐微教诲”是施特劳斯在《迫害与写作艺术》（*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1952）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意指作者面对“迫害”对著述活动的影响，为了保全自身不得已采取的独特写作技巧。这种技巧包含两种教诲：“一种是具有教谕性质的大众教诲，处在前台；另一种是关于最重要的问题的哲学教诲，仅仅透过字里行间暗示出来”（29）。显然，政治哲学式

的莎氏研究，就是在文本的字里行间寻找暗藏的政治观念，注意力只关注“文本的政治”。

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莎评领域，“这类政治哲学解读几乎只局限在施特劳斯学派内部，对主流莎士比亚研究影响甚微”（彭磊，“何谓莎士比亚的政治” 94）。与之相反，近年来在中国莎评领域，对莎剧进行政治哲学式解读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这是由于经过甘阳、刘小枫等学者的持续推介，施特劳斯学派的学术观念在国内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这种批评范式重点局限在文本内部，只需要在文本内部展开细致阅读，经过“大胆假设”自圆其说即可，并不像文化唯物主义批评一样，需要对莎士比亚时代的社会、文化问题进行细致分析与洞察，在实际操作中更为集中、容易一些。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文本的政治、作者的政治、批评的政治之间，原本就是一种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的互动关系，完全将其想当然地人为隔断是不可能的。法国文学史家朗松（Gustav Lanson）曾指出：“文学模拟我们现实的行动，表现我们争取实现的梦想，从而使我们得到欢娱；但文学真正的作用则在于提出生活不曾清楚地提出的种种问题，诸如生活的意义、世界存在的理由、我们活动的目的以及世界的演进等等。文学提出这些问题，却并未予以解决；它无需发现真理，它只消维系人们对问题的关怀”（郎松 124）。文本、作者、批评之间并非一览无余的复杂关系，直接导向对问题的关怀。这也就是朗松所认为的，莎士比亚之所以能远远超越那些“只要求绝对地真实”的作家，就是因为他能“表现事物的现实而不束缚这个现实”，“他在作品中除了简单的、肯定的、可认识的真以外，还放进了点别的什么东西”（郎松 122-123）。或许，正是那点“别的什么东西”，让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产生了魅力，成为吸引研究者乐此不疲、持续探究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莎士比亚政治批评的价值启示

中国莎士比亚政治批评给我们提供了诸多价值启示。其中，有两个方面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其一，莎士比亚政治批评是以文学审美为中心的跨政治研究，并非把文学跨学科研究变成政治研究。中国莎士比亚政治批评本质上属于文学与政治跨学科研究范畴，其研究中心应该是文学。文学跨入相关学科的理论视域中，运用其相关术语内涵思考文学问题，“强调围绕文学而形成的开阔的跨学科视野与突出的问题意识”（李伟昉，“莎士比亚与艺术跨学科研究的考察及其意义” 163），才是名副其实的文学跨学科研究。换言之，跨学科莎士比亚研究是以文学为本位、并与其他相关学科双向互动的研究，旨在通过与相关学科理论的汇通，为重新理解莎士比亚提供新的解读方式、拓展新的认知空间，使文学审美批评的内涵更为丰富多元。

一般而言，文学跨学科研究多是在影响的层面展开的，文学与政治跨学科研究也不例外。上述文学与政治关系形成的三重结构就是相互影响的结

果。从中国莎士比亚政治批评的发展历程来看，文本的政治意义并非自然呈现，而是批评家根据莎士比亚时代的创作语境与已有批评成果的共同作用下不断重构的结果；莎士比亚的政治立场并非稳定不变的历史事实，而是建立在不同时期批评家对文本的反复阐释与重估基础之上；批评的政治则深受批评者的政治环境和理论资源的制约，进而影响研究视角、方法与结论。三者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彼此关联，“批评的政治”首先影响批评家对作者政治立场的理解，并由此重构文本的政治意义；文本的复杂性又不断动摇和修正既定的作者政治立场；而作者政治立场的变化，最终反过来影响后世批评家的政治阐释。正是在这种持续互动的三重结构中，文学保持了与政治之间的张力。虽然如此，文学作为受制于社会文化与时代语境的审美体系，其生成与发展无法脱离外部环境的制约，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仅凭碎片化的文本线索，刻意挖掘文学作品中的政治意涵，更不能将文学文本与现实政治进行机械的一一对应，主观随意地放大政治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应该看到，跨学科研究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各种理论思潮的不断引进息息相关。这种跨学科带来的“理论热”与“泛文化”的倾向，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中的文学内核不断被消解，惯称的所谓“文学理论”已名不副实。于是“一些理论家研究理论以文学为对象，谈的是文学理论，但其结论并不是或者并不适用于文学本身，而是文学之外的各种思想与学说，诸如文化学、哲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蒋承勇 135）。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就反对把文学作为佐证文学之外各种理论、学说的附属品。他不满意弗洛伊德的地方，“正在于他将莎士比亚蕴含丰富、充满张力的戏剧作品完全变成了注释自己精神分析理论的材料，从而遮蔽了莎士比亚自身的价值光辉”（李伟昉，“莎士比亚” 73）。布鲁姆更是把文学依赖政治或意识形态与形而上学的批评视为“文学研究的堕落”（8）。这一态度使他一方面反对从意识形态角度解读莎剧，强调“我们并不知道莎士比亚这个人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273），另一方面又认为“莎士比亚是无功利性的一个奇迹，他既不相信也不信，既不道德化也不赞同虚无主义”（147）。我们并非否认从政治或意识形态维度解读莎士比亚戏剧的可行性，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解读的尺度与边界，需秉持审慎严谨的态度，杜绝主观臆断式的揣测。实际上，布鲁姆所说的莎士比亚“既不相信也不信，既不道德化也不赞同虚无主义”，与所谓“无功利性的一个奇迹”之间有自相矛盾之处。莎士比亚不可能是一个无思想、无立场的创作者；他的政治态度虽含蓄地嵌入情节、人物和舞台场景，但并非不可把握，关键在于运用恰当的研究方法。例如，关于莎士比亚的政治立场，学界长期存在争论：一方面认为其倾向共和主义，另一方面则认为其拥护英明君主或权力本质超越政体差异。针对这种分歧，卞之琳和吴兴华通过莎士比亚戏剧与其来源进行比较，在差异中尽可能地呈现莎士比亚政治主张的方法，不失为

解读莎士比亚意图的有效途径。¹

其二，加强批评中的主体意识，积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话语体系的莎士比亚政治批评。十七年时期的中国莎士比亚政治批评，从批评范式到批评话语都受到苏联莎评影响，具体表现在反映论思想、阶级分析方法和“先进”“反动”“人民性”等话语方面。不过，客观地说，十七年时期，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坚持并从“阶级性”“人民性”等方面出发来发掘莎士比亚的价值，也是积极构建自主知识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中国莎士比亚政治批评虽然经过了相应调整而逐渐摆脱苏联莎评范式，但又深受英美莎评的批评范式和话语的影响，没有形成真正异于西方的中国特色批评范式。学界对西方理论与批评范式的全方位引进而引发的“文论失语症”讨论已广受关注，“这个略带预言性质的判断在近三十年几成事实”（李伟昉 曹顺庆 183）。这不能不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在批评中进一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政治批评呢？当然，批评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并非一蹴而就，“只有在已有积累的基础上，通过对问题别开生面、严谨细腻地阐释与追问过程才有可能产生”（李伟昉，“方法的焦虑” 34）。我们强调自主知识话语体系构建，离不开我们所处的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离开国际语境、西方中心论，自主知识话语体系建设就失去了目标和意义。自主知识话语体系构建“不能建立在‘移植性概念’的基础上，而是必须以‘本土标识性概念’作为基础”（郭忠华 73）。所谓标识性概念，就是“区别于同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创造性和范式性”，它既标识着“一种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又代表着“该种知识体系的‘文明价值’和‘世界意义’”（孙正聿 38）。可见，彰显批评者的主体意识是自主知识话语体系构建的前提和基础，有了这一前提和基础，才有可能开始既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又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创新性自主知识话语的生产与阐发，也才能有源于中国立场的价值判断。

检视当下中国的莎士比亚政治批评，还明显存在没有超出所引用西方观点的视域，甚至是对相关西方观点的具体展开和阐释，较少提出新的问题意识。这样的研究自然也就缺乏自主性的创新表达。所以在研究中，我们不能按照西方学者的思维逻辑进行阐释，否则就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阐发到西方理论的价值观念之中，从而失去了中国学者的主体意识。因此，中国莎士比亚政治批评亟须在吸收多种理论资源的同时，持续反思自身的立场与方法，使中国特有的问题意识和价值视角自然融入对文本政治意涵的阐释之中，进而逐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学术话语。新世纪以来，在自主知识话语体系构建方面，聂珍钊为我们做出了示范。聂珍钊所倡导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既借鉴和吸纳了西方相关批评理论，又明确显示着自身的创新与超越。例如，文

1 参见 杨康恩、李伟昉：“重访‘大象的墓地’：莎士比亚来源研究的历史、困境、转向与方法论意义”，《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2024）：43-51。

学伦理学批评吸收了精神分析批评中的俄狄浦斯情结、禁忌、困境、天性、本能、意志、人性等重要概念，又加以丰富发展，创生了伦理选择、伦理悖论、斯芬克斯因子、理性意志等新的批评术语，凸显了精神分析学刻意贬低的伦理意识和道德教诲功能，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构建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¹这一构建呼应着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伦理道德的重视与追求，体现出了中国学者鲜明的学术立场与价值指向。这就是跨文化比较思维形成的中国观照，研究西方文学作品并非都是西方视角，同样折射着中国视角。总体而言，中国莎士比亚研究正面临新的历史契机。如何在既有研究传统的基础上，逐步拓展研究视野，在标识性概念的提炼与自主性批评路径的建构方面形成更具解释力的成果，已成为中国学者需要共同思考的重要课题。

Works Cited

- 阿尼克斯特：《英国文学史纲》，戴镗龄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Anikst. *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Dai Liuling et al.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9.]
- ：《莎士比亚的戏剧》，徐云生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
[—, *Shakespeare's Plays*, translated by Xu Yunsheng. Shanghai: New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1957.]
- 卞之琳：“《哈姆雷特》译本序”，《中国莎士比亚评论》，孟宪强编。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20-140页。
[Bian Zhilin. “Preface of the Translated Version of *Hamlet*.” *Selected Chinese Criticism of Shakespeare*, edited by Meng Xianqiang. Changchun: Jilin Education Press, 1991. 120-140.]
-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
[Bloom, Harold. *The Western Canon*, translated by Jiang Ningkan. Nanjing: Yilin Press, 2015.]
- 陈会亮：“《裘利斯·凯撒》中‘政制对决’问题及其意义”，《江汉论坛》10（2019）：77-81。
[Chen Huiliang. “On the Issues of Political System Confrontation and Its Meaning in *Julius Caesar*.” *Jiangnan Tribune* 10 (2019): 77-81.]
- ：“论《裘利斯·凯撒》中的矛盾冲突与‘凯撒精神’”，《外国文学研究》2（2017）：137-143。
[—, “The Political Conflict and ‘Caesar Spirit’ in *Julius Caesar*.”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 (2017): 137-143.]
- 陈嘉：“《哈姆莱特》剧中两个问题的商榷”，《外国文学研究》3（1980）：3-8。
[Chen Jia. “Discussion on Two Problems in *Hamlet*.”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 (1980): 3-8.]
- ：“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中所流露的政治见解”，《中国莎士比亚评论》，孟宪强编。长春：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2-49页；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第 141-158 页。

[—, “Shakespeare’s Political View Revealed in His Historical Plays.” *Selected Chinese Criticism of Shakespeare*, edited by Meng Xianqiang. Changchun: Jilin Education Press, 1991. 141-158.]

陈雷: “对罗马共和国的柏拉图式批评——谈《科利奥兰纳斯》并兼及‘荣誉至上政体’”, 《外国文学评论》4 (2012): 5-20。

[Chen Lei. “*Coriolanus* and the Timocratic Regime: A Platonic Analysis of the Roman Republic.”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4 (2012): 5-20.]

丛丛: “论哈姆莱特并非人文主义者”,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1989): 41-49。

[Cong Cong. “On Hamlet Who Is Not a Humanist.”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1 (1989): 41-49.]

方平: 《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Fang Ping. *Make Friends with Shakespeare*. Chengdu: Sichuan Renmin Press, 1983.]

冯伟: “罗马的民主: 《裘力斯·凯撒》中的罗马政治”, 《外国文学评论》3 (2011): 5-15。

[Feng Wei. “Democracy in Rome: Roman Politics in *Julius Caesar*.”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3 (2011): 5-15.]

——: “《李尔王》与早期现代英国的王权思想”, 《外国文学评论》1 (2013): 32-42。

[—, “The Politics of Kingship in Shakespeare’s *King Lear*.”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1 (2013): 32-42.]

高万隆: “哈姆莱特是人文主义思想家吗”, 《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4 (1986): 87-92。

[Gao Wanlong. “Is Hamlet a Humanist Thinker?”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4 (1986): 87-92.]

郭忠华: “自主知识体系视域下的标识性概念建构”, 《中国社会科学》5 (2024): 72-89。

[Guo Zhonghua. “Constructing Iconic Concep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5 (2024): 72-89.]

胡鹏: “香气的隐喻: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身体政治”, 《外国文学研究》1 (2019): 74-85。

[Hu Peng. “The Metaphor of Perfume: The Body Politics in *Antony and Cleopatra*.”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9): 74-85.]

——: “仪式、巫术与政治——《麦克白》中的御触”, 《国外文学》3 (2020): 77-85+158。

[—, “Ritual, Witchcraft, and Politics: The Royal Touch in *Macbeth*.” *Foreign Literatures* 3 (2020): 77-85+158.]

洪子诚: “1964: ‘我们知道的比莎士比亚少?’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 《文艺研究》11 (2021): 64-77。

[Hong Zicheng. “1964: ‘We Know Less Than Shakespeare’: World Litera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11 (2021): 64-77.]

蒋承勇：“‘理论热’后理论的呼唤——现当代西方文论中国接受之再反思”，《浙江大学学报》1（2018）：134-145。

[Jiang Chengyong. “Calling for Theory after ‘Theory Heat’: Reflections on the Recep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 China.”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1 (2018): 134-145.]

郎松：“文学与科学”，《郎松文论选》，徐继曾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84-127页。

[Lanson, Gustave. “Literature and Science.” *Selected Literary Theories of Lanson*, translated by Xu Jizeng.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2009. 84-127.]

李伟昉：“方法的焦虑：比较文学可比性及其方法论构建”，《中国比较文学》3（2021）：27-36。

[Li Weifang. “Anxiety of Metho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mparability and Its Methodology Construc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3 (2021): 27-36.]

——：“莎士比亚与艺术跨学科研究的考察及其意义”，《社会科学战线》3（2023）：156-164。

[—, “Shakespeare and Art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Its Significance.” *Social Science Front* 3 (2023): 156-164.]

——：“莎士比亚：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隐秘之源”，《人文杂志》7（2018）：67-73。

[—, “Shakespeare Was the Secret Source of Freud’s Psychoanalysis: With Bloom’s Western Canon as the Center.”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7 (2018): 67-73.]

李伟昉、曹顺庆：“从批评的‘失语’到‘重写文明史’：曹顺庆教授访谈录”，《文学跨学科研究》2（2023）：181-193。

[Li Weifang and Cao Shunqing. “From the Critical ‘Aphasia’ to ‘The Rewriting of Civilization History’: An Interview with Cao Shunqing.”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2 (2023): 181-193.]

乔·莫兰：《跨学科：人文学科的诞生、危机与未来》，陈后亮、宁艺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

[Moran, Joe. *Interdisciplinarity*, translated by Chen Houliang and Ning Yiyang. Nanjing: Nanjing UP, 2023.]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列奥·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刘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

[Strauss, Leo.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translated by Liu Feng. Beijing: Huaxia Press, 2012.]

列宁：《列宁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Lenin. *Selected Works of Lenin* Vol. 4,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by the Central Bureau of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

孟宪强：“是开明的君王形象，还是专制暴君的典型？——重读《裘力斯·凯撒》”，《外国文学研究》1（1996）：86-90。

[Meng Xianqiang. “An Enlightened Monarch or an Authoritarian Tyrant?—Rereading *Julius Caesar*.”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1996): 86-90.]

彭磊：“《科利奥兰纳斯》中的政治身体寓言”，《国外文学》2（2022）：67-77。

[Peng Lei. “The Body Politic in Shakespeare's *Coriolanus*.” *Foreign Literatures* 2 (2022): 67-77.]

——：“何谓莎士比亚的政治——论当代莎士比亚政治批评的四种范式”，《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6（2021）：85-96。

[—, “Four Paradigms of Contemporary Shakespeare Political Criticism.” *Drama (The Journal of the Central Academy of Drama)* 6 (2021): 85-96.]

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14页。

[Remak, Henry.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 Materials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dited by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 Group,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P, 1986. 1-14.]

孙家琇：《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

[Sun Jiaxiu. *Shakespeare's Four Tragedies*. Beijing: China Drama Press, 1988.]

孙正聿：“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基础”，《中国社会科学》7（2024）：38-51。

[Sun Zhengyu. “Original Concepts and Iconic Concepts: Conceptual Foundations for Constructing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7 (2024): 38-51.]

王忠祥：“《麦克白》的政治倾向与艺术特色”，《外国文学研究》1（1982）：3-11。

[Wang Zhongxiang. “The Political Inclination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Macbeth*.”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1982): 3-11.]

吴兴华：“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北京大学学报》1（1956）：105-126。

[Wu Xinghua. “Shakespeare's *Henry IV*.”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1 (1956): 105-126.]

肖锦龙：“莎士比亚社会政治观新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4（1993）：22-27。

[Xiao Jinlong. “A New View of Shakespeare's Social Politics.” *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4 (1993): 22-27.]

杨康恩、李伟昉：“重访‘大象的墓地’：莎士比亚来源研究的历史、困境、转向与方法论意义”，《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2024）：43-51。

[Yang Kangen and Li Weifang. “Revisiting Elephants' Graveyard: The History, Dilemma, Turn, and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Shakespeare Source Study.” *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5 (2024): 43-51.]

叶舒宪：“从哈姆雷特的延宕看莎士比亚思想中的封建意识”，《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985）：59-69。

[Ye Shuxian. “The Feudal Consciousness in Shakespeare’s Thought from Hamlet’s Delay.” *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 (1985): 59-69.]

于艳平、李伟昉：“古罗马社会的女性、身体与政治——以莎士比亚笔下的伏伦妮娅形象为中心”，《浙江工商大学学报》3（2022）：13-23。

[Yu Yanping and Li Weifang. “Female, Body and Politics in Ancient Rome: Centering on Volumnia in *Coriolanus* by Shakespeare.” *Journal of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3 (2022): 13-23.]

赵澧等：“论莎士比亚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发展”，《教学与研究》2（1961）：20-27。

[Zhao Li et al. “Shakespeare’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and Its Development.” *Teaching and Research* 2 (1961): 20-27.]

张永清：“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拓展与突破”，《学术月刊》3（2022）：172-182。

[Zhang Yongqing. “The Expansion and Breakthrough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of Reflection in the 1990s.” *Academic Monthly* 3 (2022): 172-182.]